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docs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一士谭荟

徐一士◎著

中华书局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一士谭荟

徐一士◎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士谭荟/徐一士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10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ISBN 978 - 7 - 101 - 05604 - 4

I. —… II. 徐… III. 中国 - 近代史 - 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0711 号

-
- | | |
|-------|--|
| 书 名 | 一士谭荟 |
| 著 者 | 徐一士 |
| 丛 书 名 |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 责任编辑 | 欧阳红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
| 印 数 | 1 - 4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5604 - 4 |
| 定 价 | 28.00 元 |
-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

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整理说明

先父徐一士,原名仁钰,字相甫,号蹇斋,生于1890年11月,卒于1971年11月。出身于仕宦家庭,祖籍江苏宜兴,其祖父徐伟侯道光年间进京赴试后人宛平籍,于丁未年(1847)与李鸿章同科中进士,并自此结为通家之好。父亲徐致愉1870年在京中举后分发山东任知县,举家迁鲁。先父于1910年毕业于山东客籍高等学堂,随后经清学部考试,授予举人出身(时称“学校举人”或“洋举人”,有别于科举举人)。两年后迁居北京,1924年在北洋政府实业部(后改农商部)矿政司充任科员、主事。1928年起,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担任编纂员,直到1955年退休。在早期任职期间,还曾兼任平民大学新闻系、盐务专科学校、北京国学补修社、北京国学书院讲师、教授。退休以后,经梅兰芳先生举荐,被北京市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

先父一生从事历史掌故的研究和著述,他自幼即喜读史书,他的学问主要来自于家庭的教诲,父亲徐致愉对他的成长帮助最大,对他的教育是比较开放的,无论经史子集乃至

小说笔记,都为他讲解,启发他自学。他的三兄徐仁铎精通掌故,四兄徐凌霄博学多才,都对他有帮助。在高等学堂又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精通英语,大大开阔了眼界。另一方面家庭的环境影响尤深,在清末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的二伯父徐致靖和堂兄徐仁铸、徐仁镜、徐仁录都是直接推动变法的重要人物。“百日维新”失败后罹重罪,“六君子”被诛,徐致靖因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等而列为首犯,未经审讯即被西太后判“斩立决”,只因李鸿章闻讯后鼎力营救,才改判“绞监候”,幸免为“七君子”之首,徐仁铸则被判革职永不叙用,两年后忧愤致死,遭到家败人亡之祸。维新变法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早在先父少年时期就打上深深的烙印,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改革之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方建,京、津、沪等大城市新出报刊有如雨后春笋,先伯徐凌霄与先父开始为几家报纸撰稿,从此均步入了新闻界。1913年,先父迁居北京市,就应《新中国报》聘为编辑,同年就任“报界同知会”编辑主任。他在《新中国报》发表中国近代史料文章后,由于资料翔实,立论精辟,很快在京师史学界引起轰动,众多报刊纷纷约稿,自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先后任《京津时报》、《日知报》、《京报》编辑,兼任《时报》、《国语日报》、《新申报》、《商报》、《四民日报》、《大公报》通讯,同时受《晨报》、《实报》和期刊《国闻周报》、《逸经》、《大风》、《中和》、

《古今》、《文史》、《国艺》、《大众》(分别发行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香港等地)等聘为特约撰述。他终日伏案奋笔,乐此不疲,几至废寝忘食,笔耕不辍四十年,在他多年的任公职期间,也未中断。

1929年7月7日,《国闻周报》(原发行于天津,后转在上海发行)第26期刊载了署名“凌霄一士”的《凌霄一士随笔》专栏,这是由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合作,由先父一人执笔,逐期发表的掌故文章,连载共八年,直到1937年8月9日第31期为止,由于上海沦陷而被迫中断。这是民国以来发表时间最长、篇幅最大(120余万字)、影响最深的近代掌故巨著。日寇占领北平后,先父暂时中断了写作,只在大辞典编纂处工作。然而祸从天降,1937年秋,日寇宪兵队突然来到宣南魏染胡同43号我家中,逮捕了先父,全家顿时惊慌失措。经五堂兄弟泽民(伯父徐凌霄之子)四下打听,得知缘于先父为香港《大风》杂志所撰稿中有反日内容。入狱近三个月,期间曾遭拷打。后经文化界知名友人力保出狱。经此大难,身体衰弱,原不打算继续写稿。但京、津、沪一些报刊仍不断向他索稿,文化界一些知心朋友也鼓励他继续撰写掌故文章,以飨读者。另一方面,中断了稿费收入,他以一人的微薄薪金维持当时八口之家的生活,的确难以为继,只得重新拿起笔来,应少数杂志报刊如《古今》、《中和》、《京报》、《实报》等之请,按时交稿。因有“前车之鉴”,下笔自然格外慎重,只写文史

类掌故文章。但他的爱国之心，修史之志，未曾稍泯。有两位友人当时在伪华北政府机关任职，目睹先父经济拮据窘状，先后劝他“出山”，协助他们工作，先父都婉言谢绝，表示自己年纪老了，不想为日本人做事，现在从事编纂辞书的工作很好，既可弘扬中国文化，又可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更有自己的乐趣，何必舍此乐而他求。

先父的著述虽丰，但对结集出版自己文章极其慎重，他尝对子侄们说：“出书不像在报纸上登篇文章，别人看过就忘，出了书就有人推敲了。我就怕有错误未能发现，个人名誉事小，廖种流传事大。”1944年，在瞿兑之、谢刚主等诸多挚友的督劝下，经过充分的准备，在上海文友周黎安先生的主持下，由上海古今出版社刊行了先父第一部掌故著作《一士类稿》（以下简称《类稿》）。1945年6月，上海太平书局出版了另一部著作《一士谭荟》（以下简称《谭荟》），1948年《谭荟》又再版。这两部著作所述多是清末民初丰富多彩的名人轶事，书出后吸引了大批读者，也受到史学界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初，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两部著作的合订本。在此后的20余年中，上海、四川、山西、辽宁、重庆等多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合订本或单行本。90年代初，我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台北市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徐一士多种著作，又得知掌兄徐泽民早年的同事和好友林海音夫妇家居台北市，林女士在台北创办了纯文学出版社，我通过这层关系用书信

与林女士取得联系,她热情地帮助我和文海出版社的负责人取得直接联系。经过双方书信协商后,文海出版社不久即寄来几套先父著作的原版影印本,其中一本就是《类稿》、《谭荟》的合订本,它载入该社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的第6卷,这是极为珍贵的资料。最近中华书局与长子徐禾联系,计划将先父的文史掌故著作收入《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使其广为传播,首先出版《类稿》和《谭荟》,并寄来二书的校样,嘱本人审校。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本人对此倍感欣慰。

据查,《类稿》原版收文章24篇,山西古籍出版社本由编者增加了徐一士所写《李经方》一篇。其“导言”中说:该文“原载《国闻周报》第11卷第41期,是述李鸿章之子的,有史料价值,且与本书体例一致,故附于最后,以飨读者。”因此,总计收文25篇。此次中华新版,不再收入《李经方》一篇。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类稿》,最后增加了《周跋》一文,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该文系周黎庵(劭)为《类稿》所写的校阅后记。周亦为著名的掌故家,与先父从未谋面,但神交已久,他写此文是在《类稿》出版以后,所以未载入原书。我在辽宁版中发现此文,原题即为“周跋”,考虑文章确属跋文性质,且又稀见,特据此收入周文,亦作为中华版之跋。

《谭荟》1945年原版收文章30篇,1948年再版时不知何故改分为甲乙两编,甲编收文3篇,乙编收文14篇,共27篇,

在乙编中删去了《对外趣谈》、《西人之中剧观》、《戏剧琐话》三篇。近年出版的《谭荟》，有的版本也据此删去了这三篇；山西版编者除据再版《谭荟》删除上述三文外，另增加了除一士所写原载于《国闻周报》的《谈王小航》、《谈大小九卿》两文。此次新版仍恢复1945年原版所载上述三文，总计30篇，不再收入山西版两篇增文。此外，征得责任编辑的同意，此次新版在《类稿》中增加《曾国藩与李鸿章》、《谈李秉衡》、《谈黄侃》三篇，在《谈荟》中增加《樊增祥与易顺鼎》、《谈避讳》两篇（都是在《凌霄一士随笔》中发表过的），以饷读者。原版的两部著作内容都分别载于上海的期刊《国闻周报》、《古今》和《逸经》，先父从中精选了54篇，其中以写人物者最多，约占四分之三，而人物中又以军政要员为多，如肃顺、荣禄、曾国藩、左宗棠、袁世凯、彭玉麟、段祺瑞、徐树铮、孙传芳等20余人；其次则为文坛学界人物，如王闿运、李慈铭、章炳麟、陈三立、廖树蘅、隆观易、张百熙等10余人；此外还有实业界的胡雪岩，戏曲曲艺界的梅巧玲、柳敬亭，名医薛福辰、汪守正等，这些篇章都可说是徐一士的代表作。其写人物，除广集翔实资料，详加剖析，去伪存真之外，对臧否人物极为慎重，坚持客观严正公平态度，绝不妄立一家之言，妄加褒贬。资料、判断有异难辨时，宁可存疑，或与读者商榷。叙述历史事件的，则有《类稿》中的《閩人掘藏事述》，《谭荟》中的《靖港之役》、《咸丰军事史料》、《庚辰午门案》、《庚戌炸弹案》数篇，读后可

使人对中国近代史某些事件增加了解。《谭荟》原版的最后三篇文章中,《对外趣谈》值得一读,可使人们对李鸿章的形象有新的认识。《西人之中剧观》、《戏剧琐谈》两篇对戏剧爱好者也会有所帮助。

关于本书整理问题,笔者主要根据寒斋所藏《类稿》、《谈荟》初版本,并酌情参考已经出版的其他版本,校改文字错讹。整理工作或存不当之处,谨请方家指正。

2007年8月20日

徐泽昱识于京寓亦佳庐

目 录

整理说明	1
序	1
督抚同城	5
首 县	13
裁缝与官	19
靖港之役与感旧图	25
王 鑫	56
朱洪章	65
崇实与骆秉章	82
彭玉麟与杨岳斌	88
张之洞与彭玉麟	102
荣禄与袁世凯	115
瞿鸿禨与张百熙	124

陆徵祥与许景澄	141
倭仁与总署同文馆	146
黎吉云	154
咸丰军事史料	176
陈宝琛	182
庚辰午门案(附述神机营事)	187
庚戌炸弹案	211
岑春煊	221
林开霁	231
吴佩孚与郭绪栋	242
李汝谦	245
梅巧玲	249
柳敬亭	258
万寿祺	267
邵子湘等书札	275
李审言文札	294
对外趣谈	307
西人之中剧观	316
戏剧琐话	328
樊增祥与易顺鼎	353
谈避讳	363

序

东涂西抹，遂已多年，各稿散见历岁刊物，为数颇夥。知交每劝出单行本，庶易保存，盖旧稿之遗失者已不少矣。

民国二十四五年间，曾有辑印单行本之议。乃因人事牵率，卒卒少暇。逡巡有待，竟归下止。亦以自揆学识拘墟，文辞舛陋；且多成于匆促，未能博考审思，难可遽以传世，故弗亟亟于此也。

近岁以来，日趋老惫，友好尤时以此事不宜过延为言。于是承古今出版社之约，出《一士类稿》一部。印行之后，未为读者所唾弃，良用愧幸。兹复承太平书局愿为印行，因检理丛残，更为《一士谭荟》之出版。

此编略犹前出《一士类稿》之例，所收凡三十篇，以谈述人物者为多。如谈靖港之役，述曾国藩治军初期一大事，著者情状，俾资研讨国藩为人之一助。左宗棠等，亦附及焉。他如骆秉章、杨岳斌、彭玉麟、王鑫、朱洪章等，均咸同间立功将帅。崇实非长于武略，而与秉章同官雅故，并列于篇。《咸丰军事史料》一稿，述洪杨起事后一重要阶段之当时见

闻，采自黎吉云所录。吉云则道咸间名御史，其人其诗，可供扬推。至若倭仁、荣禄、张之洞、许景澄、陈宝琛、瞿鸿禨、张百熙、袁世凯、岑春煊、林开霁、陆徵祥、吴佩孚等，或声著于同光，或名昭于民国，事迹有异，各有可传。均略事叙述，以备览观。宝琛、鸿禨、开霁，卒于民国，而其人清末遗老也。因并收入清初之明末遗老万寿祺一篇。李汝谦善诙谐，述其事借助兴趣。对外趣谈，则述清代关乎外交有趣味之故事。

光绪初年，有所谓清流党，之洞、宝琛均与其列。庚辰午门一案，可见谗谀之风。民国庚辰述此作，作六十年之回忆也。彼年又有神机营事，并附述之。

后于此案三十年之宣统庚戌炸弹案，为清民递嬗时期之重要史迹，关系之钜，尤异恒泛。拙稿述其概略，治史者或亦有取焉。

《督抚同城》、《首县》、《裁缝与官》各为一篇，关乎旧时政制及宦途之情态，同资考镜。

李详夙负文誉，拙稿录其论文之书及遗文，均言之有物。又录邵长蘅等书札，借见清初胜流之风致。

柳雨生先生函属兼收关于梨园掌故之作。余于戏剧为门外汉，然亦尝漫谈及之，特不敢涉及腔调之类耳。人物方面，收入同光名伶梅巧玲一篇。说书与演剧，理可相通。明末清初之柳敬亭，以说书享名，且与巧玲均以豪侠见称，因亦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收入。又西人之中剧观，亦有关掌故。并收入戏剧琐话二十余则，或属考证之性质，或供助谈之资料。

此编编辑之余，粗举其概。当代通人，幸予匡益！

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一士识。

督抚同城

督抚同城，势分略等，体制平行，权限之区分复相沿不甚清晰，其能和衷共济者不多见。胡林翼善处官文，俾委诚输心，资以集事，所以传为美谈也。总督官秩较尊，敕书中又有节制巡抚之文，往往气凌巡抚，把持政务。巡抚之强鲠或有奥援者，间能相抗。其余率受铃制，隐忍自安，而意气未平，齟齬仍时有之。同治五年郭嵩焘《督抚同城急宜酌量变通疏》有云：“大致以兵事归总督，以民事归巡抚，此国家定制也。而巡抚例归总督节制，督抚同城，巡抚无敢自专者。于是一切大政，悉听主持。又各开幕府，行文书，不能如六部尚书侍郎同治一事也，而参差机阻之意常多。”盖自道抚粤二三年之经历。薛福成《叙督抚同城之损》一文（光绪十六年作）征引事实以言其弊，云：

国朝例设总督八阙，巡抚十五阙，近又添设新疆巡抚一阙，而移福建巡抚于台湾。当未移以前，凡督抚同城者四：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同驻福州；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同驻武昌；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同驻广州；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同驻云南。厥初总督不常设，值其时其地用兵者设之。军事既平遂不复罢，亦俾与巡抚互相稽察，所以示维制防恣横也。然一城之中，主大政者二人。志不齐，权不一，其势不得不出于争。若督抚二人皆不肖，则互相容隐以便私图，仍难收牵制之益。如乾隆间伍拉纳、浦霖之事可睹矣。若一贤一不肖，则以小人忌君子力常有余，以君子抗小人势常不足。即久而是非自明，赏罚不爽，而国计民生之受病已深。如康熙间噶礼、张伯行之事可睹矣。又有君子与小人共事，不免稍事瞻徇者，如乾隆间孙嘉淦、许容之事可睹矣。若督抚皆贤，则本无所用其制。然或意见不同，性情不同，因而不相安者，虽贤者不免。曾文正公与沈文肃公葆楨，本不同城，且有推荐之谊，尚难始终浹洽，其他可知矣。郭侍郎嵩焘于去广东巡抚任时，疏陈督抚同城之弊，谓宜酌量变通，言甚切至。兹余姑就见闻所逮者述之。

吴文节公文裕总督湖广时，粤贼势方张，为巡抚崇纶所龌龊，迫令出省而隐掣其肘。军械粮饷皆缺，文节由此死绥，武昌旋陷。厥后惟胡文忠公与总督文恭公官

文相处最善，为天下所称诵。文忠既没，文恭劾巡抚严树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国荃为巡抚，又劾去文恭，曾公亦不安其位以去。迨伯相合肥李公总督湖广，为巡抚者本其属吏，诸事拱手受成。李尚书瀚章继之，一循旧辙。又在位日久，自此巡抚几以闲散自居，而督抚无齟齬，政权无纷挠矣。郭侍郎之巡抚广东也，适故相瑞麟以将军迁总督，颇黷货卖官，治军尤畏葸，侍郎心弗善也。上疏微纠其失，以无奥援罢去。蒋果敏公益沔为巡抚，英锐喜任事，瑞麟心惮之，严劾蒋公去职，因愈专横无顾忌。其后英翰为总督，以允闾姓缴捐事为巡抚张兆栋所劾罢。近今张尚书之洞总督两广，与历任巡抚皆不相能，朝廷至今兼摄巡抚以专其任。则督抚同城之无益，亦可概见矣。

咸丰、同治间徐之铭巡抚云南，为回所制。复倚以自固，杀升任陕西巡抚邓尔恒于境上。张尚书亮基为总督，至引疾求退，以速出滇境为幸。潘忠毅公铎为总督，方图以回攻回，之铭洩其谋，忠毅遂遇害。光绪初年，总督刘岳昭与巡抚岑襄勤公毓英不相能。舆论皆不直总督，浸至罢黜。潘鼎新巡抚云南，盛气陵总督刘武慎公长佑，颇蔑视之。刘公郁郁上疏求去，朝廷罢鼎新，慰留刘公。此皆督抚不能相容之明证也。

福建督抚之外又有将军及船政大臣，政令歧出，尤

不能划一。自巡抚移台湾，复裁船政大臣，而总督兼理船政及巡抚事，未始无裨于政体。余谓湖北、广东、云南三行省，皆可废巡抚而以总督兼理，如福建之例。……

述督抚同城事颇详。后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均裁撤，如所主张。文中引噶礼、张伯行事，列诸同城，则噶礼为两江总督，驻江宁；伯行为江苏巡抚，驻苏州。虽同省而与同城之官有间也。胡思敬《国闻备乘》（作于光绪季年及宣统间）卷一及卷二有云：

督抚同城，权位不相下。各以意见缘隙成齟齬，虽君子不免。两广总督那彦成与巡抚百龄相攻讦，百龄寻以失察家丁议遣戍。继百龄者为孙玉庭，劾彦成滥赏盗魁，彦成亦被逮。及百龄再至两广，以玉庭蕙懦，复劾罢之。此君子攻君子也。吴文镛初至湖广，与巡抚崇纶不协。崇纶百计倾陷，以孤军无援死黄州（按死于堵城）则小人攻君子矣。郭嵩焘权粤抚，不一年，见事权尽被总督侵夺，戚然不安。疏请罢抚院，不报。云贵总督魏光燾与法人议路矿约已定矣；巡抚李经羲监临入闱未知也。出则尽反前议，总督大恚。经羲力求去，朝廷恶其奏辞不逊，遂削职。张之洞在粤与倪文蔚争，在楚与谭继洵又争，但未露章相诋耳。戊戌诏罢云

南、湖北、广东三巡抚，旋复设如故。谕旨言总督主兵事，巡抚主吏事。然总督位望较崇，之洞任两广时自言有节制巡抚之权，不能限其专治兵不问吏事也。至光绪三十年，复用前诏罢三巡抚，留总督，事权始一。然总督名实不称，载之国史，徒滋后世之疑，云贵总督驻云南，未尝问贵州事。两湖总督驻武昌，未尝问湖南事。推至两广、闽浙、陕甘，莫不皆然。江苏幅员不及四川四分之一，总督驻江宁，巡抚驻苏州。提督驻清江浦，兼兵部侍郎，专制淮南。同于督抚，江督名节制三省，其实号令不出一城，遑问皖赣。宜将六总督各正其名，如直隶、四川，斯得之矣。

张之洞督两广时，潮州府出缺，私拟一人授藩司游百川。而百川已许巡抚，遂压置勿用。之洞大怒，即日传见百川，厉声责曰：“尔邈视我而媚抚院，亦有所恃乎！”百川曰：“职司何恃之有！旧制兵事归总督，吏事归巡抚。职司居两姑之间，难乎为妇，不得不控制办理。”之洞益怒曰：“巡抚归总督节制，天下莫不知之。汝安从得此言，其速示我。我当据汝言入告，以便脱却吏事不问也！”百川惧，归检会典，仓促无所得，忧之至呕血。之洞持之急，遂谢病归。自是广东政权尽归督置而巡抚成虚设矣。后戊戌变政，凡巡抚与总督同城者悉裁罢之。不数月，孝钦再出垂帘，下诏复设如故。诏言督抚分管

兵政吏治。虽同居一城，各有所司，毋庸裁汰。如百川前所云云。乃知总督兼辖两省以资策应，盖国初专为用兵而设。遇兵事则有节制巡抚之权，吏治非所问也。之洞非懵于掌故也，平时恃才傲物，狭小汉家制度，故事事把持如此。

所述可与薛文合看。张之洞之为总督，自负才望，最喜任事，良为事实。惟言广东藩司是游百川，则甚误。百川于光绪八年正月已由顺天府尹擢仓场侍郎（时之洞以阁学简山西巡抚未久，光绪十年始督两广），并无出任粤藩之事。游姓而当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为广东藩司寻乞休者，盖游智开也。智开湖南新化人，以举人州县起。百川山东滨州人，由翰林台谏起，未可误为一人耳。（智开乞休，在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后。之洞离粤时，智开方署粤抚也。）总督对兼辖之省分，虽非完全不能顾问其事，而视所驻省分得以就近统辖者自属迥殊。故通常对云贵总督简称曰滇督，两湖（即湖广）总督曰鄂督，两广曰粤督。（广东、广西虽有两粤之称，而通常以粤指广东，桂指广西。）闽浙曰闽督，陕甘曰甘督，均就所驻省分称之，偏重可见也。两江总督，情形又为特异。驻地为江苏境内，却与江苏巡抚不同城，且自有江宁布政使受其直接指挥。（清初安徽布政使驻宁，后移安庆。另设江宁布政使，与驻苏州之江苏布政使分理各属。）一省地方隐分督治抚

治，故諺者謂兩江總督乃半省總督。特江督轄三省四布政司。當長江繁富之區，復兼南洋大臣，負對外之責，其地位及權力猶甚足重視耳。光緒三十年十二月改駐清江浦之漕運總督為江淮巡撫，督治地方歸其管理。兩江總督僅亦兼轄。翌年三月即復裁撤而設江北提督，加侍郎銜。淮揚海及徐州兩道，兼承節制。體制略侔開府，與舊有駐松江之江南提督不同。思敬所謂提督駐清江浦云云，指江北提督也；惟江北提督雖加侍郎銜，却並無兵部字樣。劉永慶首任是職，刊關防，文有“欽加兵部侍郎銜”字樣。曾任淮揚海道護理江北提督之奭良，所撰《野棠軒摭言》中，訛其誤。

至總督主兵事，巡撫主吏事，雖向有此說，而界限實不易划分。既均膺兵部都察院頭銜，又同有“提督軍務”字樣。似整軍察吏，二者咸有責任。（康熙時曾諭巡撫之不管軍務者，改加工部侍郎銜，後仍悉加兵部。）又如乾隆間所修《會典》有云：“直省設總督統轄文武，詰治軍民。巡撫綜理教養刑政。承宣布政使司掌財賦，提刑按察使司主刑名，糧儲、驛傳、鹽法、兵備、河庫、茶馬、屯田及守巡各道核官吏，課農桑，興賢能，斫風俗，簡軍實，固封守。督撫挈其綱領，司道布其教令，以倡各府。”光緒間續修《會典》有云：“總督、巡撫分其治于布政司，于按察司，于分守分巡道。”總督何嘗不主吏事乎。有明設置總督之初制，至清而漸異，難一概而論。思敬之責之洞，蓋未足以服之。光緒三十年裁鄂滇二撫，三十一年裁粵

抚,督抚遂无同城者。而三十三年设东三省总督及奉吉黑三省巡抚,奉天巡抚又与总督同城。新制东督权大,奉抚仅居佐贰地位(其后时由东督兼署,不简专员),聊为督抚同城更作一尾声而已。

(民国二十四年)

首 县

昔日知县与知府同城者，号为首县。府属他州县尊称之曰首台，以其居诸州县领袖之地位也。而附郭知县，每疲于肆应，实不易为。若首县而在省会者，其地位俨为全省州县之领袖。即长官层累，趋跲倥偬，供亿纷纭，尤有疲为于命之苦，而于民事不暇尽心致力矣。清梁章钜《归田琐记》云；

小住衢州府城，西安令某极言冲途附郭县之不可为。因举俗谚“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语熟在人口。宋漫堂《筠廊随笔》已载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阳曲令，常述此语，则其来亦远矣。近时有作首县十字令者：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

服齐整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语语传神酷肖。或疑“认识古董”四字为空泛，不知南中各【大】省州县交代，【全】凭首县核算，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余在江南，尝于万廉山郡丞承纪处见英德石山一座，备皱瘦透之美。中有赵瓿北先生镌题款字，云系在丹徒任内交代抵四百金者。又于袁小野郡丞培处见一范宽大幅山水，来【亦】系交代抵五百金者。使非认识古董，设遇此等物，何从判断乎。若第十字所云，则亦惟南中冲途各缺有之，偏远苦瘠之区尚攀跻不上也。^①

首县状态之谈柄也。袁枚《答陶观察问乞病书》，痛论冲繁省会首县之不可为，语尤警动。其说云：

凡人有能有不能，而官有可久与不可久。即以汉循吏论，桐乡、渤海专城而居，此官之可久者也。龚遂、朱邑能之，至于久道化行，生荣而死哀。京兆三辅多豪强，兼供张储侍，此官之不可久者也。赵广汉、韩延寿能之，久果不善其终。江宁类古京兆，民事少，供张储侍多，民事仆所能也，供张储侍仆所不能也，今强以为能，抑而行

^① 据《归田琐记·首县》校正。

之已四年矣。譬如渥洼之马，滇南之象，虽舞于床，蹲于朝，而约束勉强，常有跼弛泛驾之虞。性好晏起，于百事无误。自来会城，俾夜作昼，每起得闻鸡鸣，以为大祥。每自念曰：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焉尔。今之昧宵昏而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彼数百万待治之民，犹鼾鼾熟睡而不知也。于是身往而心不随，且行且愠，而孰知西迎者又东误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怵人之先者落人之后矣。不踬膝奔窜，便瞪目受嗔。及至日昃始归，而环辕号者老弱万计。争来牵衣，忍不秉烛坐判使宁家耶！判毕入内，薄领山积，又敢不加朱墨围略一过吾目耶！甫脱衣息，而驿券报某官至某所。则又遽然觉，凿然行。一月中失膳饮节违高堂定省者旦旦然矣，而还暇课农巡乡如古循吏之云乎哉！且一邑之所入有限，而一官之所供无穷。供而善则报最在是，供而不盖则下考在是。仆平生以智自全，得不小小俯仰同异。然而久之情见势绌，非逼取其不肖之心而丧所守。必大招夫违俗之异累而祸厥身，及今故宜早为计也。若得十室之邑，肆心广意，弦歌先王之道以治民，则虽为游徼啬夫必泰而安之终身焉。

又《复两江制府策公问兴革事宜书》有云：

“左氏有之曰：非德莫如勤。尚书曰：六府三事惟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勤。勤之益于政也如是。今公亦知州县中有求勤而不得者乎！赤紧之地，四冲之衢，严上官之威以及其妻孥子姓，以及其僦人别奏，若行辕，若水驿，若厨传酒浆，若阖录杂赐，琐屑繁重。其能得上意者称贤，其不能得上意者称不贤。其得不得又非上下之情相通也。为大吏者率皆盱衡厉色，矜矜自持。馈刍禾不受，馈牲牢不受。然而不受之费往往更甚于受者，何哉？在大府以为吾既不饮若一勺水矣，其应备之馆舍夫马当无误也。而不知扈从之人所需不遂，则毁精舍而污之，鞭人夫而逸之，诡程途而误之。入山县则索鱼，入水县则取雉。临行或并其供应之屋幕几帘银杯象箸而满载之。诉之长官而听，未敢必也；诉之长官而不听，是徒结怨于宵小拂上意也。虽忠直之士亦多畜缩隐忍为不与较之说以自宽，而不知为政之精神已消磨于无益之地矣。

其在会城者，地大民杂，事务尤多，不知每日参谒之例。是何条教。天明而往，日昃而归。坐军门外听鼓吹者几何时，投手版者几何时，待音旨之下者几何时。忍渴饥，冒寒暑，而卒不知其何所为。以为尊督抚耶？至尊莫如天子，而未闻在京百官终日往宫门请安者。以为待训诲耶？一面不佞，何训诲之有！而父之教子，亦无终朝嚶嚶者。及至命下许归，而传呼者又至。不曰堂庑瓦漏则曰射堂须圯，不曰大府宴客则曰行香何所。略一停候一筹划，则漏

冬冬下矣。虽兼人之勇，其尚能课农桑而理狱讼哉！不知当其杂坐戏谑欠申假寐之时，则乡城老幼毁肢折体而待诉之时也；当其修垣辕治供具之时，即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权之时也。朝廷设州县，果为督抚作奴耶！抑为民作父母耶！清夜自思，既自愧又自笑也。

则分论冲衢州县办差之弊习及省会首县之难为，亦甚条畅，可参阅。明人之论此看，如唐顺之《赠宜兴令冯少虚序》有云：

丽省之邑，上承监司部使，而监司部使一省率数十人。此数十人者，满其意，皆若欲得一令而为之役，而令以一身而役于数十人。拜跪唯诺之所承应，米盐琐屑之所责办，率常以星出，以星入。燃炬而后视邑事，中夜而治文书。鸡鸣而寝，睫未及交。耳闻钟声，而心已纷驰于数十人之庭矣。驿道之令，蚤夜飭厨传，戒廩饩，走而候于水陆之冲，宾旋之往来者如织，迎于东而惧其或失于西，丰于眼而惧其或俭于北，以为得罪。幸其无呵望，欢然而出境，则骤马而归。未及脱鞅，而疆候又以宾至告矣。此两者，烦文缛礼之疲其形，惕谗畏譴之斗其心。虽有强干之资，剗割之才，且耗然而眊矣。何暇清筦库，察狱讼，注意于刀笔筐篋之间，而为俗吏之所必为者乎！而又何暇蓄其力，精其